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



1949—1987

# 中国当代文学 教程

主编 邓晓年 汪时进  
黄树红 吴国群 程大英

1949——1987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

(上册)

主编 郑观年 吴国群  
汪时进 翟大炳  
黄树红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14.5千

印数 1——10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

I S B N 7—308—00231—4

I · 019 上下册定价：9.80元

## 前 言

为适应教学需要，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7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配套，由广东、浙江、安徽、北京等省市二十余所高校的当代文学教师协作编写了《1949——1987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全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大部分，每部分除概述外，重点评述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这段历史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的某些特点及贡献。

本书主编系分工负责。郑观年、汪时进负责小说，黄树红负责散文，吴国群负责诗歌，翟大炳负责戏剧。全书由郑观年统稿。

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春林、王宗平、卢 玲、边光复、安家正、孙贵华、祁念曾、刘明川、刘安祥、刘锦龙、李正西、李中伟、李维玲、李竟成、朱家信、朱移山、冯健中、吴成栋、吴文祥、吴国群、连介德、汪时进、汪善清、杨 华、杨群碧、陈文汉、陈济本、陈正平、陈国伟、宋贤邦、张道才、林之亭、林望锦、郑志杰、郑观年、范文发、罗淑玲、孟桂芳、周成平、赵午生、赵 朕、胡德萍、饶纪林、骆寒超、徐润之、徐永年、徐玉玲、秦仲权、黄树红、黄默仙、黄 健、黄丽华、谢本良、谢淑玲、曹柏荣、曹铁娟、

康 威、高树榕、程 钧、彭得汉、翟大炳、谭伟平。

由于分散编写，难尽统一，又加时间匆促，错误与缺点定然很多，敬请批评指正。

1989.3.3.

# 目 录

## (上册)

### 小 说

1. 概述..... ( 1 )
2. 赵树理、马烽、王汶石..... ( 30 )
3. 柳青、周立波..... ( 50 )
4. 李准、孙犁..... ( 69 )
5. 王蒙..... ( 86 )
6. 杜鹏程、吴强、曲波..... ( 98 )
7. 梁斌、杨沫、欧阳山、姚雪垠..... ( 110 )
8. 罗广斌、杨益言、高云览、李英儒、黎汝青... ( 134 )
9. 峻青、王愿坚、茹志鹃、刘真、莫言..... ( 152 )
10. 路翎、魏巍、徐怀中、李存葆、刘亚洲..... ( 177 )
11. 周而复、艾芜、雷加、肖军..... ( 202 )
12. 刘心武、李国文、蒋子龙..... ( 222 )
13. 从维熙、张贤亮..... ( 248 )
14. 张洁、谌容、宗璞、戴厚英..... ( 267 )
15. 高晓声、张一弓..... ( 295 )
16. 浩然、刘绍棠、古华、周克芹、何士光..... ( 305 )
17. 贾平凹、路遥、郑义、李锐..... ( 324 )
18. 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 ( 347 )

19. 铁凝、王安忆、梁晓声、史铁生、阿城…… ( 364 )
20. 邓刚、陈建功、柯云路…… ( 394 )
21. 玛拉沁夫、李乔、张承志、扎西达娃…… ( 413 )
22. 台湾香港小说…… ( 428 )

# 1. 概 述

建国以来，小说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小说家族中，短篇、中篇、长篇三种体裁样式，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它们在我国当代政治生活和文学思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在长期的过程中，消长起伏，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

##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一种比较活跃、现实敏感性较强的文学样式。时代的风雨、生活的变迁、社会心理、人情世态的变化等，往往首先在短篇小说中得到反映；而短篇小说的活跃和繁荣，又影响和带动了其它文学样式的发展。

开国之初，人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天地里，短篇小说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表现新的世界，塑造新的人物。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最初大多是以婚姻恋爱和家庭问题表现了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登记》是赵树理进入新中国的开篇之作。这个描写母女两代人爱情悲喜剧的小说，批判了封建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表现了农村妇女对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追求，显示了赵树理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

特色。谷峪的《新事新办》中的主人公，结婚时以一头小牛做为嫁妆，新事新办，冲破了当地有关婚嫁的老规矩。马烽的《结婚》通过一对青年人一再为集体利益而推迟婚期的故事，表现了五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觉悟，但作品的矛盾冲突过于巧合。随着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变革的日益深入，李准在1953年发表了《不能走那条路》。这篇作品虽然在艺术上并不成熟，但它反映了土改后农村正在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表现了农民中共同富裕的愿望与个人发家致富思想的冲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后，一批描写农村生活的新作相继问世。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吉学霏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方之的《在泉边》、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浩然的《喜鹊登枝》等，都反映了农村的新生活，歌颂了农民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反映战争生活和民主革命斗争的短篇小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纷纷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许多作品。老作家巴金满腔热情地写出一组歌颂英雄的志愿军战士和中朝人民友谊的短篇，后来结集为《英雄的故事》。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取材新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艺术上颇有特色。稍后，在反映革命历史斗争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王愿坚的《党费》，以饱含革命激情的笔墨，描绘了在革命处于危境时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心，揭示了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境界。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短篇，将英雄人物置于极其激烈的斗争和严峻的考验中进行塑造，显示出悲壮的风格。



肖平的《三月雪》和菡子的《妈妈的故事》，发掘前辈英雄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精神，激励当代人建设新生活的情与勇气。孙犁的《山地回忆》、《吴召儿》，从不同侧面反映革命战争，表现了根据地人民高尚淳朴的精神世界。

工业题材的短篇创作较弱，但建国初期胡万春等一批工人作家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短篇小说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试验、探索和开拓的特色。建国之初，就有一些作家从多方面努力探索文学表现的新领域。他们或者试图更深入地揭示现实社会的复杂矛盾，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如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触及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新生活面前都需要改变旧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问题；或者不满足于单纯地描写英雄人物的行动和功绩，而致力于揭示人物纯洁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如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取材于战争生活，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此外，朱定的《关连长》、秦兆阳的《改造》、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丽罢》等，都是有特色的作品。但是，由于文艺批评中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些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其后果，不仅作家长期受挫，而且助长了小说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对作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些作家正在酝酿或已经动笔创作长篇巨著，还有一些作家从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进行新的探索，短篇小说也因之而出现了一个活跃的新局面。首先，在创作倾向上摆脱了“无冲突论”的影响，一批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勇于触及时弊，起到了令人震聋发聩的作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

大胆揭露了党的机关工作中的因循守旧、官僚主义作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五十年代的“政治衰老症”患者刘世吾的形象，有一定的警醒作用。此外，还有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李国文的《改造》、何又化的《沿默》、李准的《灰色的篷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虽然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并不一致，但都比较敏锐地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现实矛盾，大胆抨击了官僚作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弊端。其次，在文学的表现领域上，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阿章的《寒夜的别离》等一批表现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作品，突破了爱情描写上老一套的旧框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深入了一步。尤其是在《红豆》中，女作家以她那委婉细腻的笔触，专注于对人的感情世界的揭示，写出了人物内心强烈而复杂、曲折的感情矛盾，真切动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然而，1957年的政治暴风雨摧残了这些绽开在“早春”天气的鲜花，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它们才得以重新开放。

五十年代后期，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高潮，短篇小说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篇章。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等作品，表现了革命战争年代那动人的军民之情、同志之爱，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艺术上也充分体现了短篇小说以小见大、凝炼集中的特点。特别是茹志鹃的《百合花》，选材立意独具匠心，文笔细腻，风格清新秀美，在同类题材中别开生面。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王汶石的《新

结识的伙伴》，虽然是以“大跃进”为背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左”的烙印，但是由于作品不重事件描述而重人物刻画，把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塑造得十分生动突出，表现了农村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过程中的新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质。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以其不同于当时潮流的思想主题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受到重视。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成功地运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基层干部形象。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则以浓郁的乡土气息、诙谐的语言和淡雅的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杜鹏程反映成渝铁路建设的一组短篇，如《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延安人》，王宗元的《惠嫂》、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张天民的《路考》等，都以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艺术画面，映现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动景象。

当然，这一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粉饰生活、回避矛盾、助长“左”风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已被历史所淘汰，是毕竟在文学发展的途程中留下了不光彩的印痕。

六十年代初的政策调整和“现实主义深化”主张的提出，为短篇小说创作注入了一些活力，使它又一度呈现出活跃的势头。当时有两类作品值得重视。一类作品从不同角度或隐或显地针贬了“左”倾错误，较早地对那场“左”的思潮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反思”（当然是有限的）。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赞美了普通人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精神，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上乱刮“共产风”、浮夸风的不满。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马烽的《老社员》、西戎的《赖大嫂》、刘澍德的《老牛筋》、欧阳山的《乡下奇人》等，都属此类作品。另

一类是历史题材短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冯至的《白发生黑丝》等作品，表现封建时代文人学士坎坷的经历和不幸遭遇，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理想。这些短篇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面对现实，有感而发，借用古人的故事寄喻今人的思考的一种探索。

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在发展中几经浮沉，划出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轨迹。但其创作成果仍然是可观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却使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创作，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代文学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伟大转折，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新时期十年来，小说创作从繁荣走向繁荣，并日益呈现出丰富复杂、多样化、多元发展的状态。在这个嬗变的过程中，短篇小说往往是率先进行探索并表现出新成果的。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一篇具有拓荒价值的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力量和独特的人物形象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它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时代的要求，预告着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开始恢复。谢惠敏作为第一个“伤痕人物”，进入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紧接着，卢新华的《伤痕》以母女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触动了亿万人内心的创伤，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此后，亚平王的《神圣的使命》、陆文夫的《献身》、戴晴的《盼》、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一大批揭露“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歌颂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正义力量的短篇小说泉涌而出，成为当时文坛上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当代小说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短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和繁荣。作家们忠于生活，直面人生，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敢于踏入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从深刻揭露十年动乱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并探索其历史的经验教训，到热情歌颂“四化”建设中的带头人，表现各个领域的新面貌以及探讨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等等，使短篇小说创作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

从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寻找和追溯“左”倾思潮的源流，是作家所关注的新课题。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在历史、现实和梦幻的相互交错中，揭露“左”倾思潮对党群关系的极大破坏。张弦的《记忆》尖锐地揭示出现代迷信的危害和践踏普通人的尊严、价值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刘真的《黑旗》、方之的《内奸》、锦云和王毅的《笨人王老大》、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都是作家从新的思想高度对过去生活再思考的产物。

高晓声以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展示了建国以来农民的历史命运，描绘了一幅幅或悲或喜、悲喜交织的农村生活图画，唱出了一首农民组曲。为盖三间草房而吃尽苦头的李顺大，他的造屋史令人心酸。摘掉了“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不再为温饱发愁，进城卖油绳住招待所的奇遇，使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多层次的展现，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带着因袭的重负的八十年代的农民。何士光的《乡场上》以凝炼的笔墨写了发生在乡场上的一个小风波，却折射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农民命运的变化——因为穷，过去在乡场上抬不起头的冯么爸，如今挺起腰杆来做人了。此后相继出现的王润滋的《内当家》、张一弓的《黑娃

照相》、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铁凝的《哦，香雪》、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邵振国的《麦客》、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李贯通的《洞天》等短篇小说，都深刻地表现了改革年代中农民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以及精神上、心理上的苏醒等。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在改革的时代大潮中最早诞生的。作品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有朝气、有魄力、又有实干精神的改革者形象，也揭示出工业战线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此后，作者又写了《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短篇。柯云路的《三千万》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力挽狂澜、敢于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丁猛的动人形象。陆文夫的《围墙》则以幽默而犀利的笔锋，剖析了现实生活中阻碍改革的种种弊端陋习，并与之对照地塑造了一个肯于实干的青年人马而立的形象。其他如陈建功的《丹凤眼》、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邓刚的《阵痛》等，都是有鲜明特色的作品。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在新时期首先突破旧的创作模式，着力于描写战争中的人，努力展示当代军人（尤其是青年军人）美好高尚的内心世界，同时不回避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宋学武的《敬礼！妈妈》、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兵车行》、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石言的《秋雪湖之恋》等，都显示了军事文学的新进展。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对爱情伦理题材小说的新拓展。前者描写了爱情和婚姻分离的现象，表现了作家对一种不受经济、政治、道德、义务所左右的“现代性爱”的探求，和对社会伦理道德

的大胆质疑，曾在读者中引起争议。后者深刻揭示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对婚姻爱情的制约，说明在经济极端贫困的条件下，是很难滋生爱情的花朵的。张弦的另外三个短篇：《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银杏树》和向彬的《心祭》、张抗抗的《夏》、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等短篇，在婚姻、爱情以及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领域内，都表现了各自独特的思考和探索。

汪曾祺幸运地占有一片独特的领域。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短篇描写了苏北水网地区旧日的生活，表现了存在于普通群众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描绘了一幅幅水乡风俗画，淡雅清秀，韵味无穷。陆文夫的《小贩世家》、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方之的《内奸》等，通过对市井居民生活故事的描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新的时代风貌。

对知青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表现，亦有好的短篇。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史铁生的《我们遥远的清平湾》，都是反映知青生活的佳作。近年来，文学新人李晓发表了《继续操练》、《机关轶事》等作品，以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为描写对象，其观察之深入、态度之冷峻、文笔之老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张洁的《条件尚未成熟》，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知识分子岳拓夫的卑琐阴暗心理。

短篇小说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有新的探索和开拓。王蒙的《春之声》、《风筝飘带》等作品，率先使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着力于表现人物细微的、隐秘的内心活动，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绪的波流，使这类作品呈现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面貌。茹志鹃不再拘泥于“从头道来”的呆板的叙事顺序，而运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作品所

要表现的各个时代的生活故事“剪辑”在一起，从而大大扩展了作品的时空容量。宗璞和湛容两位女作家，将变形和荒诞手法运用于小说创作，写出了《我是谁》、《蜗居》（宗璞）和《减去十岁》（湛容）等短篇。李国文的《月食》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取得了成效。老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在行文上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不追求结构的严谨，更不进行语言的雕琢，形成了一种散文化的独特风格。青年作家何立伟，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刻意追求小说创作中的意象美，他的《白色鸟》是一篇情节与背景淡化而意境悠远、深邃的好作品。

### 中篇小说

当代中篇小说创作，在建国后的十七年，虽不及短篇小说的活跃和长篇小说的成熟，但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

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在中篇小说中占有较大比重。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是一部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作品，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展现了我军鄂西渡江战役的情景，描绘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战斗雄姿。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描写了内蒙草原上的一支干部队伍在与土匪遭遇时英勇善战、团结对敌的大无畏气概。其他如陈登科的《活人塘》、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谢雪畴的《团指挥员》等，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革命斗争的历史风云，歌颂了广大军民的革命精神。此外，陆柱国的《风雪东线》、海默的《突破临津江》等作品，使抗美援朝战争在中篇小说中得到了反映。

描写农村生活的中篇，以孙犁的《铁木前传》为最佳。作品通过铁木两家两代人友情的建立和破裂，反映了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揭示出生活的复



杂性。这篇小说，文笔优美，风格清新，浓郁的诗情和深邃的哲理相融汇，艺术上很有魅力。刘澍德的《桥》和《归家》，分别发表于五、六十年代，两部作品都以细腻、生动的笔融，描绘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赢得了不少读者，后者还曾引起过热烈的争论。此外，柳青的《狠透铁》、康濯的《水滴石穿》、李准的《冰化雪消》、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变化和农民新的精神面貌，散发出泥土的芳香。

工业（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虽经大力提倡，仍然比较薄弱。但杜鹏程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佳作。作品深刻揭示了人民内部的新旧思想冲突，特别是铁路建设者之间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卑琐的个人主义的斗争，提出了“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这一严肃的课题。小说写得深沉而富有激情，具有较高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十年动乱”的前五年，是个“没有小说”的年代。1972年以后，出现了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边子正的《敌后小英雄》等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显示着作家在非常环境中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努力。同时还要看到，广大作家这时身处逆境，在生活的底层与恶势力进行着不屈的抗争。严酷的境遇，在客观上成了他们日后进行创作的生活积累，使一些作家在新时期的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篇小说这个一向不被人们重视的文学样式，迅猛崛起。仅从数量来看，就相当可观。1979年发表中篇八十多部，到了1982年，产量即达六、七百部，相当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总和。不仅数量大增，而且